

文

东

21世纪：  
东亚文化与国际社会

主编：梁守德

副主编：魏海、潘国华

当代世界出版社

化

亚

## 序

我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北京大学东西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21世纪：东亚文化与国际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式开幕，热烈欢迎与感谢各国专家学者对我们的支持。

中国有句名言：“隔行如隔山”。意思是说，外行难说内行话。我们一大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涉猎文化问题，并不是赶时髦，把自己打扮得华丽点，而是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把学科建设深化一步。何况今天的高科技发展正在日渐瓦解“隔行如隔山”的现实，综合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以及新学科的涌现，都是从外行说内行话开始的。可以说，“外行说内行话”是学科深入发展和新学科诞生的必由之路。国际政治同国际文化的结合、交叉和统一，是全球化的结果，是正确认识和判断当今国际关系的关键。其实，外行说内行话，也是一条规律。

有位名人说过一句寓意深刻、发人深省的话：“没有文化的国际政治，只能是尔虞我诈。”这讲的是政治同文化联系的重要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联系更加紧密，而每个国家的外向活动都是在本国文化背景中发生的，国家间关系可以说是不同文化氛围互动的关系，不能只注重政治、经济、安全层面，而要深挖这些层面的文化底蕴，寻找文化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对国家、民族、个人均形成制约，既为它们提供总体利益的根

基和观察思考问题的工具，又能确定内外活动的框架和模式。政治是表面现象，文化则是深层次的因素，政治同文化结合，必然更为全面，更为深入。

政治与文化，既紧密相联，又各自独立。政治是国家的上层建筑，显现社会的基本面貌。文化则是国家的标志，显现社会的灵魂。各国政治，纷繁复杂，但均注重群体利益，主要表现为权力的运作和利益的维护。国家政治，究其核心，就是政党政治。各国文化，一多相融，但均注重“以人为本”，主要表现为智慧的开拓和文明的培育。国家文化，究其核心，就是民族灵魂。因此，国际政治更易于发生冲突，对抗多于合作；国际文化更易出现交流，兼容多于排斥。政治与文化的结合，不仅相互渗透，相互制约，而且充满民族精神，更能显现国家特色。它要求各国相互间共处而不冲突，对话而不对抗，交流而不封闭，兼容而不排斥，共存共荣，共同前进。

应该承认，西方文化，繁荣先进，东方文化也博大精深。我们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也不赞成东方文化中心主义。世界是在多样化中前进的。国际文化的发展，不是一种文化取代其他文化，搞清一色的文化，而是多种文化共存，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我们以东亚文化为视角研究国际问题，既要深挖东亚文化的精华，也要放在东西方文化比较中寻找自身的特色。作为社会科学，包括国际政治学，都有深刻的本民族文化底蕴，均会显现自己国家的特色。有特色，才能有交流，才会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没有特色，只会盲目照搬，也无交流的必要，一切均会落空。我们的国际学术会议的任务，就是以国际社会为舞台，在东西方文化比较中，发掘东亚文化的精华，建设中国的国际政治学，以鲜明的东亚文化特色的面目自立于世界学科之林，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1999年联合国第57届大会决定，2001年为“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我们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于今年举行，正逢其时，其重大意义不言自明。我们希望我们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对话年添砖加瓦，把我们中国的国际政治学建设大大推前一步。这本论文集就是这次研讨会的成果。

梁守德

2001.7.8

于北京蓝旗营小区

## “21 世纪：东亚文化与国际社会”国际 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适应 21 世纪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拓展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强化国际关系研究的文化底蕴，交流中外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总体研究成果，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在新世纪的创新发展和交叉发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北京大学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于 2001 年 7 月 10~11 日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21 世纪：东亚文化与国际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专家教授 50 余人与会，其中包括日本岛根县立大学校长宇野重昭教授、法国波尔多大学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马特教授、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奥德尔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管理系主任关信基教授、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魏尊教授、亚太科技协会理事长余传韬教授、东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野千鹤子、土耳其中东科技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艾拉尔普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南开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单位的专家教授。

以文化与国际社会为主要议题召开国际学术会议，这在我院还是第一次，由于各方努力，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为期两天的会议共分为四个部分：探讨国际趋势的宏观发展；分析各国文化

和其国际关系的联系；研讨文化与自由、民主问题、人权问题的关系以及文化对一些社会现象的影响。虽然会议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天，但是先后有二十多位学者进行了主题发言。他们的发言涵盖了以上四个方面，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上展开了广泛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少颇有新意的见解：1. 东方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和特点；2. 东亚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3. 东西方文明互相补充的问题；4. 文化与民主、人权、社会的关系；甚至还包括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女性主义、好莱坞电影等诸多文化经济领域的问题。

### 关于文明和国际行为的思考

在谈到文明的冲突的时候，宇野重昭教授认为，西欧文明陷入其他文明这一现象必然引起许多冲突；西方文明世界缔结同盟就是为了阻止儒教国家的扩展。但是日本没有像中国和新加坡那样可以结成“文明伙伴”的民族国家，甚至连日本的侨民也与日本文化失去了联系。日本人从不承认他们的文化是孤立的，而认为自己是“多元文化主义者”；所有的外来文明都是普遍性的文明，他们以“诸神合一”的形式与本国的固有思想结合起来，这一点是外国人很难理解的。宇野教授同时还认为，未来世界文明的普遍性必须在人类解决共同的历史性的问题的进程中产生，根据“相互触发论”树立普遍性文明。

来自南开大学的蔡拓教授首先辨析了文化全球化的概念。他认为，文化全球化就是文化的同质化和殖民化。其中，同质化有助于国际关系的缓和与改善，并为处理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理念与准则；而文化的殖民化反映着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从而毒化了国际关系并阻碍了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当然，对于前者，我们应当认同并推动它的发展，努力构建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机制；对于后者，我们要提高同

文化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自觉性与有效性。

土耳其的阿蒂拉·埃拉尔普的论文可以被看作是蔡教授的观点的例证。他详述了土耳其在1987年4月向欧共体提出申请正式成员资格之事，在欧洲和土耳其引发了一场土耳其是否是一个欧洲国家的重新评估，而且导致了土耳其国内反欧情绪的上升。

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的王晓德教授更认为，文化的作用体现在“有形”和“无形”两个方面。以美国对外关系为例，前者主要指美国政府为实现某种或某些外交目的而有意识地向国外推行具体的文化政策，这种形式就是“文化外交”。后者主要指美国决策者在控制和执行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存在于他们意识深层中的文化价值观体现出来，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打上明显区别于他国的烙印。另外，美国外交决策的价值观都可以在美国文化中找到根源，比如：教化弱小民族的“救世主”倾向、注重功利的实用精神和反共反恐的意识形态等等。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时殷弘教授的论文题目是《中西伦理与当代国际干涉》。文中论述了现时期的国际干涉在伦理上涉及的三个基本方面（强国与弱国间关系的伦理、不同民族间关系的伦理、国际干涉本身的正义性或道德合法性标准）和值得讨论的五项伦理（毛泽东一代的共产党人的伦理、当代共产党人的伦理、西方经典现实主义的伦理、西方经典自由主义的伦理、当今西方自由国际主义伦理）。

人权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矛盾的焦点。朱锋副教授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人权起源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不具有普遍性，在其他国家的文化和传统观察中不一定包含这样的个人权利概念或者有关人的人性和理性的哲学渊源。因此，国际人权事业在本质上是一个“跨文化”的过程，不断地促进合作、发展与和平，是人权普遍性不断克服其相对性的惟一途径。他指出，有关人权问题的国际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文化相对主义。这场争论不仅来源于对国际关系中迄今仍然存在

的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问题，也关系到国际关系对文化现象的基本认识问题。由于每个国家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特殊的民族文化，并渗透到国家制度、社会结构和不同民族法律文化和权利意识，因此，文化毫无疑问是影响各国人权保障实践的一个突出因素，也是观察今天国际人权问题的不可回避的基本背景。

### 对中国相关文化现象的反思

这次与会的还有亚太科技协会的理事长余传韬教授。余教授不仅是我们的老校友，对中国的传统文明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他的报告主要是提出基于民意的政权、平等与自由三项民主政治的内涵。老先生认为中华文化的“致中和”的理念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地寻求更好的平衡点，而创造更和善的“和谐体”，“中华文化的‘致中和’精神的发场，不仅对中国，并将对更美好的全世界，造就最大的贡献”。在余老的发言中，经常地引用儒家典籍的精彩文字，足见其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功力，也因此，其见解更具说服力。

复旦大学俞正樑教授的观点和余老的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但是，俞教授是以中华文明的战争和和平观为切入点，主张以和而不同，和而不流的中庸之道来寻求双赢的最佳妥协。

相比之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许振洲教授关于“堕落的自由”的论述不拘泥于对传统的承袭，而是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解析，来说明我们的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并希望以此引申出更深沉的思考。他认为，政治权力的相对弱小、相对有限，群己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界限的划清，当然是保障人们政治自由的基本要素。但我们又应看到，这还没有包括自由得以保全的全部条件。实际上，自由是否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中是否有一种宽松的气氛、一种宽和的精神；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自由



主义者，首先在于他是否能对他人，对他人的思想、行为、选择持一种理解、宽容的态度。如果在一个国家中，政治体制是民主的，法制也是健全的，但却缺少宽容的气氛，那么个人的自由未必能够得到真正的尊重和保障。因为多数人完全可以通过民主的手段，通过合法的程序立法，去限制他们所不欣赏、不理解的思想与行动。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个人可能有着全部成文的政治权利，但却未必真正享有自由。或者换一个说法，人们可以享有政治自由，却没有享有社会的自由。

针对有关自由观的问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唐士其副教授在他论文《中西传统自由观的比较》中认为，就中国的情况来说，从近代以来，以西方的“自由”反对自身传统中的“专制”，已经是一个持续了一百多年的话题。这个话题至今仍在持续，说明了这种要求的生命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半。如果我们相信对于自由的追求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惟一动力这样一个基本的命题，那么就必须承认，如果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一种对于自由的执着，也就没有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存在与发展。

如果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某种类似于自由的思想观念，那么在这里不仅有一个语言之间转换的问题，即在中国和西方文化的系统之间对围绕“自由”而展开的各种思考进行一系列的概念与语境的等值的替换，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在具体的对话环境中通过中西方历史上自由观念的发展的对比，揭示出这两种自由观的相对价值及其缺陷所在，从而最终为人们对自由的更为普遍，也更为具体的理解提供一种新的可能的线索。

北京大学外交学系主任叶自成教授的研究相对而言就更为具体一些。他以春秋战国为研究的背景，分析其中的各种外交思想流派：霸权学派、仁义学派、自然学派等等。他认为，他们分别代表了古代中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最高成就，与西方近现代才出现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有许多的共同之处，表现了中国的独有的特色。他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经历了一个自

成体系的国际社会，而且，这一国际社会关系丰富多彩而复杂多变，中国在当时思想文化蓬勃发展的基础下，形成了具有相当价值的流派众多的外交思想。由于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共性和历史发展契机和经历的某些相似性，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与西方几千年来外交思想有很多对应点和相似性。更广阔地来看，这不能不让人思考人类文明发展的很多问题。当然，由于中西方文化、思维方式固有的差别和历史具体条件不一样，还有时代上不可忽视的差距，它们之间也有许多的差异。这样的差异，突出了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性格特点，也是更为值得探讨和研究的地方。

来自淡江大学的魏萼教授则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于新新儒家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上。他的发言清晰地总结了历代对儒家文化的诠释和挖掘，特别是清以后儒家文化的发展，而这种发展都是和当时的经济背景相联系的。魏教授认为，20世纪西方主流的资本主义已经没落，西方反主流的共产主义已经走入低谷，事实证明“第三条路哲学”东方价值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将逐渐被肯定。在21世纪里，台湾的经验、中国的道路、儒家的思想、东方的文化、亚洲的价值、人类的福祉等等息息相关，值得重视。

### 文明的冲突

“文明”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这样就大大拓宽了本次会议讨论的范围；各国的社会现象，民俗风貌甚至是与其他国家在文化上的冲突对立。

日本的波平惠美子教授谈到的是在中国还很少有人关注的“尸体器官移植”问题。器官移植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人们对人体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这种认识深深地植根于文化当中。日本人的传统理念认为，火化是改善活着时候的肉体身份的方式，而不是处理它。因此，将一个器官从死者身上摘走，代表着

没能为死者确立一个新的身份。所以说，尸体器官移植的困难在于日本人对人的资格的认识，其根源就是日本的社会关系和日本人对生与死的理念。

另外，从经济现象中挖掘文化根源的也不乏其人，南加州大学约翰·奥德尔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论文的题目是“世界贸易组织协商一致原则遇到的问题”，主要的篇幅是在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并对前景进行展望。由于共同体制的建立必须是在各种力量保持平衡的基础上的（对于是否应该认可所谓的“共同体制”尚有争议），各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就成了关键；再进一步，发展和发达国家的各个方面的协调需要双方互相尊重，求大同。

这次会议还邀请了几位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女学者，她们最为关注的自然是妇女问题。来自韩国的 Jae buie Lee 教授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她首先介绍了韩国的妇女状况，并且把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作为文化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教授的发言得到了其他学者的一致响应，他们认为，当今的妇女组织的目标和影响已经大大超出了家庭的范畴，无论从家庭、社会、文化或是政治、经济等角度考虑，都将引起广泛的重视。

东京大学的上野千鹤子教授把亚洲的现代家庭进行了比较，其中也包含了对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的探讨。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照看儿童和老人这一无形的工作，体现了家庭分工的不平等，根据“现代家庭”的特点，老龄化趋势的日渐明显，限制了女性就业和服务社会的可能性。其中，上野教授分析了存在于日本社会的相应的现象。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十分宽泛的，这不仅是因为各位学者专攻的方向不同，各有所长，也是因为希望为各位学者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畅所欲言。教授们也都是有备而来，事前认真地准备发言，直到发言前仍在对内容不断地进行修改、补充。这样的

学术盛会当然是大家的交流思想，汲取各家之长的好机会。因此，各位学者也都认真地研读其他人的论文，互有启发。

除了主题发言以外，会议的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学者之间的自由讨论。大家可以就主题发言提出自己的疑问或者思考。每次发言结束的间歇，都会有人积极地举手发问，有的是要弄清楚刚才听得含混的观点，有的是希望发言人再就某个观点进行更深入的阐述，更多的是要就该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其中不乏新鲜的思路，看来这种近距离的交流对于发言人自身和其他与会者都是一个相互提高的过程。

总的来说，会议全程讨论热烈，代表们畅所欲言，讨论深入细致，严谨求实。不少代表表示，他们通过此次学术会议扩大了知识面，增长了见识。

(张孝菊 根据记录和论文整理)

# 目 录

## 序

“21 世纪：东亚文化与国际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

中国传统思想中之民主精神 …………… 余传福 (1)

亚洲价值观与东西方精神文明的交融 …………… 黄心川 (5)

### 经济全球化与新新儒家

——从中国经济的文化资产谈起…………… 魏 尊 (10)

堕落的自由…………… 许振洲 (33)

中国和西方外交思想的历史文化比较…………… 叶自成 鹿 琦 (41)

人权与文化相对主义…………… 朱 锋 (64)

中西传统自由观的比较…………… 唐士其 (96)

### 日本对多元文化世界的靠近

——普遍性与独特性 …………… 宇野重昭 (127)

西方的“狡猾的帝国” …………… 马 特 (132)

世界贸易组织协商一致原则遇到的问题…………… 约翰·奥德尔 (146)

西方民主原理的局限性与原旨儒家精神之比较 …… 卢正邦 (168)

## 全球化与人体和人格

——尸体器官移植问题中体现的日本文化的

多样化..... (191)

中国伦理传统与当代国际干涉 ..... 时殷弘 (196)

中华文明中的战争与和平观 ..... 余正樑 (212)

文化的全球化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 蔡拓 (220)

试论文化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 ..... 王晓德 (237)

中国文化传统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当代

建构 ..... 余萧枫 贾亚君 (252)

对全球化形势下亚洲地区国际关系驱动力

的思考 ..... 高伟浓 (263)

当代西方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与对象的转换 ..... 王乐理 (272)

儒家思想与国际关系 ..... 周永生 (299)

## 附录:

会议日程安排..... (320)

出席会议人员名单..... (325)

# 中国传统思想中之民主精神

余传韬

1998年5月我十分荣幸以校友的身份应邀参加北大一百周年紀念大会。那天的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主席台上后面正中挂了北大两个大字的圆形北大校徽，校徽的左右稍低位置则分别是阿拉伯数字的1898及1998。江泽民主席为北大校庆题词：“发扬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精神，为振兴中华做出更大的贡献。”题词中包括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北大的校训。

北京大学是民国八年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当年的主张就是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与科学。

今天就“中国传统思想中之民主精神”这一个题目，提出基于民意的政权、平等与自由三项民主政治的内涵，向各位请教。

一、民主政权为基于民意之政权：中国传统意识但教统治者与民同欲，而未尝教人民盲目服从。与民同欲就是统治者要顺从民意，争取民意的认同。

大学说：“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大学又说：“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政权的得失，是在于民意之向背。而民心之向背，则在于政权之善或不善，大学又说：“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如何才是不善呢？违反民意就是不善，所以大学又说：“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执政者要“先慎乎德。”有德才能获得人心，大学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

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执政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德性？大学提出两项：主忠信而舍骄泰，大学说：“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二、平等的观念：两百二十五年前美国的独立宣言，一开始就宣称：多样它本身就是显然而不须任何说明的真理，第一项就是人人生而平等。中华的传统思想中人人人生而平等理念甚为丰硕，谨以下列二项阐明之：

(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有一言可以终身奉行的吗？孔子答曰：“其恕乎！”意思是哪有这样简单，勉强说来，就只有一个“恕”字。然后孔子再加以说明，“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待人如待己，涵盖了人人平等的意念，以及实现人人平等的具体方法。

(二)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两句话说明中华文化中仁爱与平等的精神。第一个“老”和第一个“幼”字是动词，分别的意思是“孝”与“慈”，总的来说就是仁爱心的一个“爱”字。这种仁爱的心情，其对象包含所有的“老”“幼”。(在实际的行为上“吾”之老幼，与“人”之老幼，有先后之别。对“吾”之老幼之爱，行有余力，才“以及人之老幼”。历史上只有战国时代的墨子要老幼所有的老幼，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不过这种顺序的差异，不是基于吾之“老幼”与人之“老幼”，人格上有任何差异，吾之“老幼”与人之“老幼”人格上平等一致。只是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力有所不及。)

三、自由的观念：自由的意义就是人得依其良知所示，自决其行为。人世的堕落，由于虚伪；人生的腐化，由于自欺；违反良知，是一切罪恶之源。大学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又说：“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孔子的学生宰我问三年之丧，认为三年太长，一年已经够久了（期已久矣）。孔子间接地问他心安否？宰我说“安”。孔子答以“女



安则为之。”尊重他人良知，不加干涉，是孔门一重要示范。

自由权的行使，有时得排除外界的压力，自由精神就成为反抗精神，大无畏精神。伯夷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上，孔子就曾一再颂扬；韩愈作伯夷颂，说伯夷特立独行，穷天地，互万世而不顾。这句话，足以表现自由精神之伟大。

本文上述中国传统思想中尚民意、平等与自由等理念与近代民主精神相契合。下节将略述尚民意、平等与自由理念之渊源，以作本篇之结语。

四、中国致中和的文化大格局衍生出尚民意、平等及自由等理念，而形成传统思想中的民主精神：

我国民性尚执中而不喜偏激，是以民性实际而旷达，雍容而不怠，多情而崇义，尊己而扬人——执中之性，随处表现。执中之教始自尧舜，而至孔子集其大成。

中：任何事件，因其存在而显现，是一和谐体，是许多事物、力量所造成，而此一和谐体形成时，这些事物、力量间的平衡点就是中。大而言之，宇宙的“中”，是宇宙间万物、万事、万力的平衡点，宇宙靠此平衡点“中”才能显现而稳定。小而言之，一乡、一镇、一学校的“中”是组成此一和谐体乡、镇、学校内各种事物、力量的平衡点；而乡、镇、学校的显现与稳定，依赖此平衡点“中”。

中道：万物、万事、万力随时都在变动，有一变动就会打破旧的平衡点，旧的和谐被破坏，而产生另一新的平衡点，新的和谐体因而呈现。在变动的过程中，把握住关键因素，使新的平衡点形成一个更和谐的新体就是中道。

关于“中”之一字，有“时中”、“中庸”及“中和”等解读，三者之间我们觉得“中和”最为完善，也可以包含“时中”与“中庸”的精义。

中和：中和就是复杂的事、物、力的关系中，最和谐的关系。“致中和”则是以此最和谐的关系为目标，而致力以赴。